

《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世界的中国最强音

□ 李宗远

国歌是国家重要象征和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在抗战硝烟中诞生的战歌，不仅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浴血奋战，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海外唱响、在世界激荡。

田汉、聂耳携手谱战歌

1934年秋，剧作家田汉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反映知识分子由象牙塔走向民族抗战战场，《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的主题歌，是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交完剧本不久，田汉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电通影片公司很重视这个剧本，请夏衍撰写电影台本，请聂耳为主题歌作曲。《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原是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衬纸被茶叶水滴湿，字迹模糊。夏衍和电影编导孙师毅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

聂耳拿到田汉创作的歌词后，很快就谱出了乐谱的初稿。在谱曲过程中，聂耳经过思索、讨论，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初稿完成后，传来了国民党特务要逮捕聂耳的消息。按照党组织的决定，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聂耳在日本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曲谱，不久将《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定稿寄回国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1935年7月，田汉出狱，那天正逢《风云儿女》首映，看到影片特刊上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大黑体字，

他非常兴奋。得知聂耳去世的消息，田汉痛哭不已，写下悼念聂耳的七律，其中有一句“高歌共待惊天地”。

《义勇军进行曲》发表后立即成为广泛流传的抗战歌曲，奏响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最强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各根据地军民更是经常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唱一支中国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

刘良模是著名爱国人士，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组织民众歌咏会，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慰问抗战将士。1936年1月淞沪抗战4周年纪念日当天，刘良模指挥数千民众共唱《义勇军进行曲》。1939年，在浙江金华教唱抗战歌曲时，刘良模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开展的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坚持下去。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深造，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教唱中国抗战歌曲。通过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刘良模结识了著名黑人歌唱家、演员、社会活动家保罗·罗伯逊。

罗伯逊出生于美国普林斯顿，他的父亲曾是美国南方黑奴，早年为改变自己的奴隶身份，投奔北方参加南北战争。受其影响，罗伯逊毕生都以争取自由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远在大洋彼岸的罗伯逊关注着中国，1938年2月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上，罗伯逊发表演说，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在与罗伯逊的交往中，刘良模把中国人民的抗战歌曲唱给他听。罗伯逊最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他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但唱出了中国人民争取自

由独立的决心，也唱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争取自由解放的决心。刘良模把它译成英文，罗伯逊很快学会了这首歌，不但可以用英文唱，而且能用准确的汉语演唱。

几个月后，罗伯逊在纽约举行音乐会。晚会即将结束时，罗伯逊在场的数千名听众宣布说：“今天晚上我要唱一支中国歌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这支歌叫作‘起来！’”接着，他用汉语和英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唱完后，全场掌声雷动，听众要求他再唱一遍。刘良模回忆说，听众非常喜欢这支歌。散会以后，大家还唱着“前进！前进！前进！进！”走回家。从那以后，罗伯逊就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到美国各地举行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之一。《义勇军进行曲》逐渐在美国的进步人士中间流传，他们将这支歌叫作《起来！》。

《起来！》唱响美国走向世界

为了使中国的抗战歌曲在美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刘良模和华侨青年合唱团计划把中国的抗战歌曲灌制成唱片，并且认为演唱这些歌最合适的就是罗伯逊。1941年春天，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罗伯逊。罗伯逊高兴地说：“对！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我愿为战斗的中国人民歌唱，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于是，罗伯逊担任独唱，刘良模指挥的华侨青年合唱团担任合唱，灌制了以《起来！》为名的一套中国抗战歌曲唱片。这套唱片共三张，灌录了六首抗战救亡歌曲和中国民歌，分别为《起来！》（《义勇军进行曲》）、《军民团结》、《新凤阳歌》、《锄头歌》（《锄头舞歌》）、《游击队员之歌》（《到敌人后方去》）、《中国军人之歌》等。唱片发行的全部收益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唱片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唱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美国、英

国、印度及南洋各地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国，《义勇军进行曲》也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并灌录成唱片，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

联合国成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该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战争胜利后，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1949年春，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与其他同志前往参加。抵达布拉格后，代表团得知大会有一个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这让大家感到为难：新中国还未成立，国歌也没有选定。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大胆提出：就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参会代表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和为歌曲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刘良模。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节奏，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中外、历久弥新，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化身，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

（作者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副馆长）

红旗渠的廉洁魅力

□ 万银峰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历经10年修建，长度达1500公里。这项倾当时河南林县全县之力、总投资达1.25亿元的浩大工程，却没有出现过贪污挪用行为和干部失职渎职现象，让人深切感受到红旗渠精神中的廉洁魅力。2010年5月，红旗渠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命名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扎紧制度笼子，人人心中有戒。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根本。红旗渠由林县（后改林州市）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参与修建的民工超过10万人。在开工战线长、用劳动力紧、后勤管理人员极少 的情况下，要把庞杂纷繁的人财物管好用好，只能靠严密的管理制度，靠党员干部的遵规守纪意识。

1960年2月，工程全面启动伊始，林县县委就建立了工程建设总指挥部、营、连和排四级管理体制，各管理层级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体系。据档案记载，仅组织建设、思想教育、生活保障、岗位责任、施工安全、财务管理方面的制度规定就有190多项。特别是为加强对管理岗位和领导干部的约束，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三条纪律，以及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治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八项注意。

为使各项制度规矩落到实处，提高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林县监察委员会在工程开工不久，就出台了《关于目前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要点》，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遵规守纪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党员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明白重大工程面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为深化教育活动成果，县委还发出通知，要求从县级干部做起，“不准用公款请客，不准拿公共财物送礼”；从县委县政府开始，“外来客人看戏、看电影一律由个人买票，不准让剧团赠票”。这些自上而下、率先垂范的措施，给权力画出了“红线”，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公私界线分明，不占公家便宜。公私分明方能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红旗渠始建于物资极度匮乏的20世纪60年代初，修建周期长，物资渠道不一，数量种类繁杂，而且由于一线劳力需要，人财物管理人员多次轮换。但跨越10年的红旗渠工程建设中，建设者们心里都有本“公私账”，没有出现侵占公家财物的现象。

当时最大的工程量是劈山开渠，但炸药供应一直很紧张。林县县政府就自力更建起了炸药厂。副厂长高仁福带着十多名技术骨干吃住工地，用硝酸铵配食盐熬制炸药。带的口粮不够吃，他们就到处采野菜、捞河草充饥。这些食物没有食盐就更难以下咽，而且长期不吃盐人就会经常感到乏力、浮肿，甚至走不动路。但十几名制造炸药的工人，面对眼前堆着小山一样的食盐，没有人去偷吃一口。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盐是公家的。

红旗渠纪念馆有一件令参观者驻足唏嘘的纪念品，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旧炸药箱。掀开箱子，在箱盖的背面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收据”。上面写着“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委员彭士俊”，盖着工程建设指挥部的财务“大印”。当年在建设工地上，民工们都是几个月轮换一次，指挥部工作

的同志长时间守在工地时间久了，换洗衣服和一些个人用品无处存放，大家就想用废旧炸药箱存放个人的物品。但因为废旧炸药箱是公家的东西，谁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委员彭士俊听到后，就汇报给了指挥部总指挥长马有金。后来开会决定由财务部门按每只0.75元作价出售，且每人只限一只，彭士俊也跟着买了一只。为了证明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大家就把把财务收据贴在了箱子盖的背面。

上下一律平等，谁也不能特殊。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是红旗渠建设中的廉洁密码。红旗渠动工建设，不仅建设物资紧张，而且粮食极度匮乏，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工程建设指挥部那些领导干部，既要现场指挥、熬夜开会，还要与民工们一起，在开渠一线劳动。但是，这么繁重的工作，领导们不仅没有加班“补助”，而且还把自己的口粮降低到民工之下。

红旗渠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当时渠上的干部和民工的粮食日补助标准为：1960年2月至4月，民工2斤、干部1.5斤；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1.8斤、干部1.5斤；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1.2斤、干部0.8斤；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民工1.5斤、干部1.2斤；1961年6月至1966年5月，民工1.8斤、干部1.2斤。在红旗渠建设工地上，随着自然灾害的加剧，粮食供应标准不断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干部口粮标准始终低于工地上的民工口粮标准。

工作任务繁重、粮食供应标准低，造成很多领导干部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后勤供应的同志就在最大限度解决民工吃饭问题的同时，想给领导们开个“小灶”。有一天，县委书记杨贵在建地与民工一起劳动，晚上回来还要开会，炊事员就用小米给他蒸了一碗“硬饭”。杨贵饭后对炊事员说：“为什么我要比人家特殊呢？大家吃啥我吃啥！”炊事员说：“你晚上还要加班开会，得吃点耐饿的‘硬饭’。这饭是给您做的，你不吃谁也不会吃。”杨贵当场发了火。结果，这碗小米饭只得被炊事员端去，倒进“照月亮”（工地上比喻饭稀）的稀饭锅里，搅和搅和大家一起分喝了。

“赣水那边红一角”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江西万载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 朱一华 钟 晟



江西省万载县仙源乡人民政府左侧的罗家脑上，矗立着一座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纪念塔分为塔台和塔身两部分。塔台高1.8米，台壁正中有一幅泥塑浮雕画，画面是高举着第16军和第58团战旗的红军及紧跟其后的男女赤卫队冲锋陷阵的场面。塔身底座长4.1米，高2米，塔通高9.9米，塔顶有伞状的挑檐，并竖着高70厘米由钢筋弯曲而成的五角星，塔身四面均塑有醒目文字，正面为“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背面为“为国牺牲永垂不朽”，左右分别为“为有牺牲多壮志”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纪念塔左侧的石块上刻有《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碑记》，全文如下：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红五军转战湘鄂赣边区，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十二大红色苏区之一。

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由修

水移驻万载小源（今仙源），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全新局面。作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七个省苏维埃政府之一，仙源一度成为湘鄂赣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因此，素有“小莫斯科”之称，为配合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湘鄂赣苏区人民积极投身于苏区的保卫和建设，特别是在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湘鄂赣苏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先后取得了“株木桥大战”、“茴果大战”等几次著名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牵制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十余人，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后来写下了“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著名诗句，高度赞扬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人民取得的辉煌业绩。

在保卫红色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湘鄂赣苏区人民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支援前线，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红色政权，成千上万的先烈长眠在湘鄂赣苏区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仅万载苏区就先后有两万多名革命先辈为国捐躯，其中英名在册的先烈就有五千九百余人。

为继承先烈遗志，铭记先烈业绩，谨修工农红军革命烈士纪念塔为记。

中共万载县委员会
万载县人民政府
一九七五年十月

碑文简要概括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重点记述了小源（今仙源）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高度赞扬了湘鄂赣苏区军民在党领导下为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敬读碑文，令人感慨万千，催人奋进。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小莫斯科”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于1928

年7月开始创建，位处三个省会（武汉、长沙、南昌）、三条大江（长江、湘江、赣江）、三条铁路（粤汉、湘赣、南浔）之间，是最靠近国民党军事政治交通中心城市的重要苏区。它不仅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胸膛之上，更是连接中央、湘赣、湘鄂西、豫鄂皖、闽浙赣等苏区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独一无二。

1932年4月12日，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以下简称“省苏”）及其他省级机关从修水上杉迁至万载西北边境的小源。小源西接浏阳、北临铜鼓，四面环山，进可攻、退可守，再加上这里群众基础好，革命热情高，非常有利于开展武装割据。湘鄂赣省苏机关驻扎于此长达一年零10个月，是湘鄂赣省级机关连续驻扎时间最长的地方，小源一度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湘鄂赣省苏驻扎小源期间，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党员人数由1930年的1万多，增长至1932年的5万多，壮大了革命骨干力量。为了强化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和革命宣传，各级苏维埃政府在机关中普遍开设列宁室，工作人员在此读书、看报；同时广泛组织“共产党礼拜六工作”，增进了党群关系。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省苏土地部制定了《进行整理和分配土地实际办法的指示》，促进了土地分配；颁布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农村劳动暂行法令》，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省苏财政部发布严禁预征税收的通告，对个别县预征税收的做法给予了严厉批评；省苏教育部开办列宁小学146所，儿童入学率达到90%，创办报刊和传单39种，创作红色歌谣360首、戏本29个，通俗易懂地宣传了革命主张。当时，湘鄂赣苏区到处可闻笑声、歌声、读书声，到处可见看书、看报、看演戏的情景，极大丰富了苏区群众

文化生活，有力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牺牲“小我”顾全大局

1930年6月至8月，组建了以湘鄂赣子弟为主要力量的红三军团。为了拱卫中央苏区，红三军团毅然离开自己的大本营，挥师东渡转战赣西南，只留下了力量相对单薄的红16师保卫湘鄂赣苏区。此后，湘鄂赣苏区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坚决执行“向东南发展”的指示，不仅将省委省苏驻地处于湘鄂赣中心位置的修水上杉迁至中央苏区的前哨万载小源，还主动发起数次军事行动，通过威逼南昌和南浔线，牵制了敌人60多个团的兵力，以巨大牺牲支援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1934年“六七月事件”以后，湘鄂赣苏区岌岌可危，比中央苏区早4个月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本身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湘鄂赣苏区军民仍然不忘全力支援中央苏区，他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高举红旗，前赴后继，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湘鄂赣苏区群众不惜一切支援革命的事例数不胜数。1933年2月初，为解决红军医院伤病员棉衣和棉絮短缺之急，苏维埃政府面向全省民众发出了紧急募捐令。小源一位80多岁的老人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准备用来去世后“睡棺”的新棉衣送往红军医院。红军医院的伤病员得知后，都被老人的真情所感动。更多群众纷纷倾其所有，把大量衣被送往红军医院，及时解决了伤病员缺衣少被的燃眉之急。还有很多群众为支援革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湘鄂赣苏区有多达37万红军将士壮烈牺牲，还有76万群众在革命战争中遇难。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